

1930年代中國政治的非凡透視

◎ 徐有威

鄧元忠：《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力行社、復興社暨所謂「藍衣社」的演變與成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

1930年代是中國風雲際會的時代，一個叫「藍衣社」的名字曾經流傳於大江南北乃至海外，其餘波至今仍在中外回蕩不已。「藍衣社」的真實名字是三民主義力行社（簡稱力行社），它是黃埔軍校一些學生在過去的校長、當時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的耳提面命下，於1932年3月在南京秘密成立的國民黨內的政治團體。從1932—38年的六年時間中，力行社因其豐富的理論主張和眾多的實踐活動，尤因其活動的神秘感而名聞遐邇，而這一組織事實上已經在無形中影響著整個中國社會。但是，面對來自外界的無論善意或者惡意的流言，力行社自始至終保持高度緘默，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無聲的回答更加強化了組織的神秘感，這種狀況直到整整四十年後的1972年才有所改變。

1972年3月，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主辦的最具權威性的中國問題雜誌之一《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春季號，發表了時任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城分校歷史系副教授易勞逸（Lloyd E. Eastman）撰寫的〈國民黨中國的法西斯主義：藍衣社〉（"Fascism in Kuomintang China: The Blue Shirts"）一文。三個多月後，時在美國紐約馬里斯特學院執教的鄧元忠教授將此文送給其父親、力行社創始人之一鄧文儀一讀，鄧文儀讀完後又轉送給另一位力行社創始人干國勳。他們看了以後「非常生氣」，認為易勞逸之文「侮辱」了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革命運動，而該文稱力行社為法西斯組織更是「莫須有的誤謬」。

在此之前不久，鄧文儀已經開始勸說鄧元忠撰寫一本有關力行社的著作，從此鄧元忠開始了長達十二年的準備和撰寫工作。在撰寫過程中，鄧文儀、干國勳和滕傑等力行社成員給予了全力支持。一批昔日力行社的主要幹部如鄧文儀、干國勳和蕭贊育等，紛紛發表回憶文章，為深入研究力行社史提供了大量珍貴史料，同時也為此研究論著的出版鋪平了道路。鄧元忠在台灣、美國等地先後採訪了五十六位力行社、復興社成員以及有關知情者，以他們的口述和珍藏史籍為主要史料來源，同時輔以大量中外史籍作為背景及旁證，進行了認真的全面研究。據稱此項研究工作是得到蔣介石的默認才能順利進行的，由此可見1970年代台灣政治氣氛之一斑。十二年後的1984年，鄧元忠已經從美國返回台灣擔任師範大學歷史系主任兼教授，其長達702頁的《三民主義力行社史》由台北的實踐出版社出版。出版之時，在台灣昔日力行社社員和復興社社員曾專門為此開了兩場推銷會，到場者前後達一百三四十人之多。又過了十六年，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於2000年出版了此書的582頁的修訂版——《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力行社、復興社暨所謂「藍衣社」的演變與成長》。

鄧元忠的著作全面展現了力行社的發生和發展的完整過程。他認為，力行社在民國史上的意

義可以從三個角度得出結論：（一）從力行社對蔣介石事業發展的關係和意義看，力行社的組成是當時蔣介石統一國家的需要，同時也符合蔣介石「一切策略應在公開與秘密的配合下進行」的策略。隨著抗戰的開始以及力行社「發展到過於龐大，而失去其以暗配明的作用」，它在1938年被解散是可以理解的；從力行社的角度看，它強調擁護蔣介石，而且事實上建立了蔣介石「在全國人心目中的至高權威和信仰中心」。（二）從力行社與國民黨的發展關係上看，在1930年代左右，「國民黨的組織鬆懈，革命精神渙散」，力行社的出現「刺激了國民黨原來的組織，使其積極整頓，相互競爭」，故而力行社在蔣介石的領導下，「完成了有理想，有實力之護黨救國的工作」。（三）從中國現代化的過程看，力行社負責和參與了安內攘外運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國民軍訓運動和新生活運動等1930年代的重要運動，特別使當時青年的國民意識明顯增強，對國家處境的認識由懷疑進至諒解。這些都是力行社在民國史上的成就（頁527-29）。鄧元忠的這些結論，是基於其來自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的檔案資料得出的，有著八十多種中文、英文和日文圖書資料作為背景及旁證，尤其上述獨家「專賣」的來自力行社成員的珍貴口述史料、私藏或未刊的文字資料，更大大增加了此書的權威性。由此，鄧元忠筆下的力行社引起了世界各地同行的高度重視，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事實上，從1984年此書的初版面世後，曾是鄧元忠批評對象的易勞逸也對此書的成就表示敬佩，他專門撰文介紹了這一新著：「這項工作是台灣現已出版的有關國民黨統治時期史學研究最客觀的研究成果之一」，實為「30年代中國政治的非凡透視」。他還根據鄧元忠的研究成果，修正了一些自己原有的觀點；台灣學界也認為該書「實為五十年來有系統、據事實而撰寫的唯一的一本《力行社史》」，「無論如何，著者的研究總算已是圓滿的初步成果了」。在日後世界範圍的史學界內，凡是有關力行社和中國法西斯主義問題的研究，無不將此書作為必讀和必加引用的讀物。正如為此書作跋的陸寶千教授所稱，此書誠為「揭開力行社面紗的開山之作」，因為「此書性質上是一部『力行社志』」。以後如果有人要研究力行社，必須依此書為基礎，猶如有人要研究中國上古史，必須先讀《左傳》」（頁578）。同時，此書也得到了廣大讀者的關注，這更是值得作者欣慰的（頁558）。當然，這與此書的研究對象有關，也是作者辛勤努力的結果。

此書的「自序」和作為「附錄」的〈撰寫《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背後點滴〉一文，詳細地介紹了作者撰寫此書的來龍去脈和背後一些內幕故事，這對於讀者了解此書的價值有極大作用，是讀者所應必讀的。然而，此書是1984年版的再版，從那時以來世界各地的有關力行社的研究有了不少進展，但是此書並沒有充分引用，這無疑令人感到遺憾。另外，此書在許多方面的論述主要依靠力行社成員的回憶等，這樣只能做到點到為止，無法進一步充分論述。這可能是作者撰寫此書時所能接觸的史料有限所致。例如，作者只是利用力行社刊物在《申報》和《中央日報》上的廣告目錄，來幫助闡述力行社的各項主張。如果有條件、有可能詳細閱讀這些出版物的具體內容；如果更多關注中國大陸近三十年來各類新的出版物，那麼研究結果自然會更加出色。

其實，作者對於這個問題也是非常清楚的。力行社史是一個大有可為的題目，但是最重要的前提是史料的整理和使用。鄧元忠在〈撰寫《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背後點滴〉中，專門用一節篇幅提及了這問題（頁570-72）。據筆者所知，有關力行社的檔案資料，在海峽兩岸的檔案館多少都能夠找到一些，但是這和檔案保存和管理者的觀念有關，不是學者所能夠控制的；同時，據說力行社成員的家屬還保存了一些密不示人的珍貴資料；而力行社當年在各地的出版物更是不勝枚舉，其中一些已經製作成微卷供學者研究；當時世界各國對於力行社的

不少觀察和記錄，也都默默地躺在各國的圖書館中，它們既是對力行社活動的旁觀記錄，也反映了外國人對於中國現代史的評價，這是值得研究者參考的另一角度。我們完全可以作出以下斷言：只要有決心和毅力，或許還需要一些好運，那麼在鄧元忠此書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力行社史的研究，同時由此作為突破口開拓1930年代乃至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政治的研究，前景都是一片光明的。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2003年4月號總第七十六期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